

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禀赋视角和 386 份问卷数据

徐晓鹏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基于郑州 386 份农民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 区位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工作适应能力、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正向影响显著; 性别、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负向影响显著;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农民工; 务工意愿; 影响因素; 社区因素;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6)04-0056-07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dowment condition and 386 survey data from Zhengzhou

XU Xiao-peng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386 migrant workers from Zhengzhou, the analytic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venience degree of the location condition, the effect of going out to work of the community population, degree of culture, the health situation, the skill and expertise level, job adaptability, the effect of the parents go out to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of the fami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the gender, age,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of the family, the family economy income-expenditure situation and the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hav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whether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o participate in skills training, job search ability, the number of the school-age children,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that needs to take care, the economic support from the famil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income-expenditur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on't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Work; Influence Factor; Community; Individuality; Family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农户收入的 40%来自打工收入^[1]。由此可见, 农户生计模式已经发生显著转变, 从一维的农民变成了二维的“工人—农民”, 农户对外出务工

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 如何有效激励农民工外出务工已成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及当前“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提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 就必须培养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是指劳动者获得和保持工作, 并在需要时重新获得就业的能力, 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4]。有学者把农民工就业能力分为内在就业能力和外在就业能力^[5-6]。其中, 内在就业能力的核心是人力资本^[7], 社会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就业能力发生作用; 外在就业能力主要包

收稿日期: 2016-06-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50); 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2013BS016); 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2015-JD-04)

作者简介: 徐晓鹏(1984—), 男, 河南郑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括个性特质和外部环境^[8-9]。此外,学者们还从人力资本、个体适应性、职业认同、社会资本、社会支持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进行了研究和分析^[5,10-13],并提出应该从增强外出转移的组织、提升农民工素质水平、增强就业保障和加强就业技能培训等四方面来提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14-15]。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主要是从农民工个体、政府和社会支持三个层面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展开了研究。笔者认为,与农民工就业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来自社会方面的支持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来自家庭和社区环境因素的影响。为此,笔者拟基于社区、个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禀赋条件的定量分析,从社会学角度对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因素进行分析阐释,

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选取河南郑州 4 个典型的农民工聚居区作为研究样本来源地,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社区、个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的禀赋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影响。首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每个农民工聚居区抽取样本 100 个,其中有效问卷为 386 份,有效率为 96.5%。所调查的 386 份有效样本中近五年内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的有 288 人,占 74.6%;近五年内会选择返乡的有 98 人,占 25.8%,样本特征如表 1 所示。与此同时,还对问卷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典型个案进行了深入访谈,以能够更好地保证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进而更好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表 1 调查样本统计特征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变量	分类	百分比
区位便利度	非常不方便	8.6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	非常差	5.5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0	25.2
	不方便	18.6		较差	12.8		1	33.6
	方便	30.2		一般	28.5		2	28.5
	非常方便	42.6		较好	38.2		3	12.7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	一般	32.7		非常好	15.0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	0	52.6
	较好	67.3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是	33.1		1	36.7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	不明显	12.5		否	66.9		2	10.7
	一般	56.7	工作搜寻能力	较差	34.2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	非常不满意	32.4
明显	30.8	一般		43.1	不满意		38.2	
性别	男	62.4		较好	22.7		比较满意	19.3
	女	37.6	工作适应能力	较差	29.1		满意	10.1
年龄	18-28	19.2		一般	53.3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	较差	53.2
	29-40	41.4	较好	17.6	一般		35.2	
	41-48	32.6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	不明显	24.4		较好	11.6
	49-55	6.8		一般	43.3	家庭生活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12.3
文化程度	小学	12.8	明显	32.3	不满意		42.2	
	初中	58.2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	0	6.1		比较满意	18.7
	高中	23.8		1	31.8		满意	18.6
大专及以上	5.2	2		43.9	非常满意	8.2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	4.2		3	18.2	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	非常差	8.2
	较差	12.4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0	12.7		较差	34.6
	一般	20.8		1	48.2		一般	37.9
	较好	32.4		2	34.5		较好	14.1
	非常好	30.2		3	4.6		非常好	5.2

三、模型选择和变量赋值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社区(C)、个体(H)、家庭(F)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P = f(C, H, F)$$

其中, P是指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

工。主要包括以下变量: 区位便利度(x_1)、社区内邻里间关系(x_2)、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x_3); 性别(x_4)、年龄(x_5)、文化程度(x_6)、身体健康状况(x_7)、自身技能特长水平(x_8)、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x_9)、工作搜寻能力(x_{10})和工作适应能力(x_{11});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x_{12})、家庭农业劳动人数(x_{13})、家庭外出务工人数(x_{14})、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x_{15})和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x_{16});家庭经济生活(E)包括家庭经济收支现状(x_{17})、家庭经济支持情况(x_{18})、家庭生活满意度(x_{19})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x_{20})。结合变量选取情况,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20} x_{20} + \varepsilon$$

其中, y 为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 β_0 为多元回归常数, $\beta_1 \sim \beta_{20}$ 为偏回归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

将“近五年内是否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作为

被解释变量,1=是,0=否。通过该问题来深入研究社区、个体和家庭三个层面的禀赋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影响,模型中所选取的变量情况如表2所示。

接下来,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并通过所选取变量来分析近五年内农民工会继续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分析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重要性,Wald值越大说明该变量越重要。

表2 变量选取与赋值

变量	赋值	预期方向	
社区	区位便利度	1=非常不方便,2=不方便;3=一般;4=方便;5=非常方便	正方向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	1=非常不明显,2=不明显;3=一般;4=明显;5=非常明显	正方向
个体	性别	1=男,2=女	负方向
	年龄	1=18~28,2=29~40;3=41-48;4=49-55	负方向
	文化程度	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学历	正方向
	身体健康状况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1=是,2=否	正方向
	工作搜寻能力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工作适应能力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	1=非常不明显,2=不明显;3=一般;4=明显;5=非常明显	正方向
	家庭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		0=0人,1=1人;2=2人;3=3人;4=4人及以上	负方向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负方向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		1=非常差,2=较差;3=一般;4=较好;5=非常好	正方向
家庭生活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负方向
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非常满意	正方向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数据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所选择的20个变量全部引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1,结果显示社区内邻里间关系情况、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等7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把这7个变量进行剔除后再次拟合回归方程建立模型2,结果显示剩余的13个变量均显著。另外,两个模型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拟合结果都比较好(表3)。

1. 社区因素的影响

区位便利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其所处设区的区位便利度越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意

愿越强。这里所讨论的区位便利度主要包括地形(平原或者山区)和距离城区远近两个方面。访谈发现,居住地处于平原和距离城区较近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较强,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人际交往范围相对要广一些,因此利用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在外找工作也更容易,而且来自同一社区或附近社区的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在外出过程中也能够相互帮助,增强了农民工克服外部困难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二,外出交通比较方便,增加了他们与外界进行接触的机会,很多受访者所过的就是“早出晚归”的生活,不仅可以照顾家里,还可以外出务工挣钱。此外,很多用人企业也能减少相关住宿和管理支出,因此社区便利度越好的农民工相对容易找到工作,其外出务工的意愿较强。

表 3 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β	Wald	Sig	Exp(B)	β	Wald	Sig	Exp(B)
区位便利度(x_1)	2.141	5.612	0.015**	0.423	1.625	4.508	0.002***	0.403
社区内邻里间关系(x_2)	0.513	1.062	0.812	1.514	—	—	—	—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x_3)	1.912	3.872	0.017**	0.321	1.427	3.208	0.003***	0.509
性别(x_4)	-5.274	9.202	0.001***	3.62	-4.302	8.123	0.002***	2.82
年龄(x_5)	-6.129	7.186	0.003***	0.232	-7.063	10.002	0.005***	0.308
文化程度(x_6)	3.243	8.212	0.012**	0.623	2.206	6.225	0.019**	0.605
身体健康状况(x_7)	4.645	12.629	0.002***	22.124	6.568	15.124	0.000***	32.628
自身技能特长水平(x_8)	3.272	9.382	0.001***	22.216	5.250	11.212	0.002***	21.182
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x_9)	0.742	1.552	0.714	1.812	—	—	—	—
工作搜寻能力(x_{10})	0.327	1.521	0.412	0.427	—	—	—	—
工作适应能力(x_{11})	6.472	18.281	0.001***	35.226	5.250	12.417	0.000***	24.281
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x_{12})	2.864	6.942	0.003***	0.624	2.724	3.286	0.001***	0.702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x_{13})	5.419	12.237	0.021**	12.121	4.612	9.482	0.006***	140.262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x_{14})	-3.282	8.684	0.019**	0.124	-2.819	8.418	0.013**	0.098
家庭学龄子女人数(x_{15})	-1.502	3.418	0.521	0.562	—	—	—	—
家庭需要照顾老人人数(x_{16})	-2.132	7.418	0.412	0.603	—	—	—	—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x_{17})	-4.821	9.217	0.000***	16.126	-4.256	9.082	0.000***	12.234
家庭经济支持情况(x_{18})	0.842	1.451	0.612	0.724	—	—	—	—
家庭生活满意度(x_{19})	-5.602	10.291	0.000***	0.012	-6.901	12.562	0.001***	0.022
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x_{20})	2.512	1.367	0.712	1.514	—	—	—	—
常数项	-8.202	8.214	0.002***	0.002	-8.106	8206	0.001***	0.001
Predicted Percentage Correct		96.200				97.200		
-2Log likelihood		82.574				78.462		
Nagelkerke R ²		0.812				0.808		
Chi-square		252.128				253.252		
P		0.006				0.002		

注：**和***分别代表 5%和 1%水平的显著性

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5%和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而社区内邻里间的关系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社区人口外出务工显著正向影响着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意愿。访谈发现，在外出打工人数较多的农村社区，日常交流会激发那些没有外出的人群的兴趣和动机，让他们有意识地来学习外出就业的经验。这也是社区中外出务工人群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外出务工的人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返乡，因为他们已经对城市的生活充满了向往，那些在外面发展比较好的同乡也成为了他们的真实“榜样”，返乡也因此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情，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回家。由此可见，社区人口外出务工状况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具有显著影响。

2. 个体因素的影响

(1)性别。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女性受访

者的外出务工意愿比男性要弱。访谈发现，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受“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互补型”家庭模式的影响，男性往往被认为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男性的经济生活压力相对女性来说要大，他们会更多地选择外出务工获取收入。二是男性具有生理方面的优势，能够从事的工作范围也比较广，外出找工作也比较容易。不过，女性的外出务工意愿也在逐步提升，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女性的就业范围逐渐扩大，而且有些工作更适合女性来做。此外，很多农民外出时开始选择夫妻双方共同外出或者全家共同外出的形式，而且很多农民工夫妻都在从事同一种或相似的工作，为女性外出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

(2)年龄。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年龄越大，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弱。访谈发现，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年龄超过 50 岁的农民工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

不得不重新返乡务农。另外,随着农村精英劳动力的不断流失,农村社区的“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今留守在农村的人口以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很多老年人为了让年轻人能够安心在外打工,自愿留守或返乡照顾孙辈。此外,家里的土地也需要人来种,所以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就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3)文化程度。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强。其原因在于很多农村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到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将来能够走出农村,并找到好工作,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未来。这种思想在无形中增强了年轻人学习的动力,并坚定了将来一定要走出农村的信念,进而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另外,文化程度越高,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更强。很多青年农民工认为,外出务工不仅能够获取较好的收入,而且还能丰富个人经历,增加自身的见识和能力,自身就业能力也得到不断提升,从而为家庭生计贡献更多的力量。

(4)身体健康状况。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强。这是因为农民工外出务工时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留守在农村的年轻人当中,很多就是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好,或者在外打工过程中受伤或残疾才被迫返乡的,他们只有回家才能够得到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而且城市管理部门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其中针对身体健康和卫生情况等方面的规定尤为严格。因此,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就要按照规定办理健康证等一系列证件。这些规定对农民工外出务工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而那些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的人群的外出务工意愿则受到了严重抑制。

(5)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和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自身所具备的技能或特长水平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从事体力劳动也需要掌握一定技能,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他们找

工作将更加容易,收入水平也更高,因此自身具有特长的人外出务工意愿相对更强。这种现象在年轻人身上表现最为明显,那些受家庭支持比较多的年轻人在求学阶段往往会学习一些专业技能,主要就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方便一些。不过,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农民工自身技能主要是通过不断丰富就业经历和积累工作经验来提升,而真正参加技能培训的机会则不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多数流于形式。

(6)工作适应能力和工作搜寻能力。工作适应能力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农民工的工作适应能力越强,其外出务工意愿就越强。访谈发现,农民工外出获得工作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凭借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获得工作,因此他们所能获得的工作范围比较有限。而且,受自身文化素质水平和严峻的就业压力的影响,农民工工作质量也难以令人满意。他们只有快速提升自身的工作适应能力,并通过不断丰富就业经历和积累工作经验,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外出务工意愿。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能力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一般是从亲人朋友那里获得工作机会,因而与其外出务工意愿没有直接关系。

(7)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父辈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越明显,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目前,年龄集中在18~35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88%左右,他们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多数都有外出务工经历,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很多都有跟随父母外出的经历,因此对城市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向往,从而激发他们外出务工的兴趣和动机,增加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父母也会给他们提供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以及提供外出务工经验指导,减少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帮助他们快速地适应工作环境和城市生活。

3. 家庭因素的影响

家庭农业劳动人数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家庭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

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虽然土地在农民眼中仅仅是简单的生存资本,而且农业生产对农民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弱,但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需要留守一部分人群来种地。当家庭中留守的人群能够满足农业劳动的需要时,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就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就能够继续外出打工挣钱。尽管当前农民对土地的价值思考已经从农业生产价值转向土地的货币价值,但对于农户来说,农业生产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外出时往往要为家庭的农业生产进行考虑和平衡。

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在两个模型中分别通过了 1% 和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弱。访谈发现,土地和年幼的孩子依然需要人照顾,所以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人数不能过多,需要留守一部分人来完成这些事情。当家庭中留下足够的人来照顾土地和年幼的孩子时,那些剩余的劳动力就可以选择外出打工,而且对于夫妻共同外出或家庭全部外出的形式来说,他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也能够相互支持。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和家庭需要照顾老人人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和笔者的预计不相符合,可能由于所调查的样本数比较小,因而出现了与实际不太相符的情形。

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而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打工收入满意度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家庭经济收支现状的满意度越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收入需求。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据很多农民工反映,如果在农村就能够获取相关收入,他们就不会背井离乡选择外出务工。由此可见,农民外出务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家庭生活质量和水平,他们外出务工时省吃俭用给家里寄钱,或者挣钱后返乡就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对于农民工来说,要想提升外出务工意愿和收入水平,就要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收入,更多是为了谋求自身能力的提升和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

家庭生活满意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负。这表明受访者对家庭生活满意度越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强。访谈发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消费水平越来越高,这在无形当中也拉动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农村家庭生活压力自然而然就增大了。相比之下,家庭生活满意度也就越来越低,而农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务工的意愿自然就有所增强。其二,随着外出务工年轻人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追求个人发展的动机也越来越强,而且随着外出过程中个人见识的增长,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

五、结论与相关建议

社区、个体、家庭等方面的禀赋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区位越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越明显、文化程度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自身技能特长水平越好、工作适应能力越强、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越明显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越多,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越强;女性、年龄越大、家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对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越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就越弱;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影响则不显著。

要想提升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意愿,关键是要解决好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一,从个体角度来看,要综合考虑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人口结构情况,以决定个人外出务工对家庭生计影响的利与弊。另外,个人除了从家庭获取支持和帮助之外,还要通过个人努力不断积累工作经验,以谋求个人就业能力的提升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其二,从家庭角度来看,家庭除了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行物质投入之外,还应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

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解决好家庭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夫妻或全家共同外出形式的家庭来说则需要在他们外出过程中相互支持和帮助,在此基础上,农民工才能够安心在外工作,并不断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质量,进而为家庭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从社区角度来看,农民工不仅要利用社区的区位优势通过外出务工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而且还应该在外出过程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人际交往范围,并得到来自同一社区和附近社区居民的支持和帮助,以增强自身抵御外部困难和风险的能力。总之,为提升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意愿,不仅需要取得企业、政府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还要从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禀赋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只有综合考虑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因素,逐步形成从个体、环境到制度层面的完整的就业能力支撑体系,不断增强农民工的外出务工意愿,更好地帮助农民工就业和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 [1] 陈锡文.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求是,2010(21):40-43.
- [2] Forrier A, Sels L. The concept employability: a complex mosaic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003(2): 102-124.
- [3] Fugate, Kinickia A J, ASHFORTH B E. Employability: a psycho-social construct and its dimensions, and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65): 14-38.
- [4] Ronald W. Mc Quaid and Colin Lindsay. The Concept of Employability [J]. Urban Studies, 2005, 42(2): 197-219.
- [5] Zhao Yao hui.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 47: 34-40.
- [6] 张伟.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14-18.
- [7] 李后建,卞小娇,尹希果.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0(3):62-70.
- [8] 王成斌.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J].江海学刊,2004(6):98-104.
- [9] 张新岭.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开发刍议[J].人口与经济,2008(2):23-27.
- [10] 杨金凤.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与外出动机之间的关系分析——以山西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3):53-62.
- [11] 钱文荣,张黎莉.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及其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家庭式迁移至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9(5):70-78.
- [12] 谢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民工就业境况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5):49-55.
- [13] 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125-129.
- [14] 李树苗,任义科,靳小怡,等.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1-9.
- [15] 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责任编辑:曾凡盛